

长江还在奔腾（长城万里图）第二部

十二月六日的汉口中央银行和往日不一样，仿佛人忽然换了一身新装，叫别人一下子认不出来了。虽然依然是用巨石砌成的屋基，依然是大楼高耸在汉口繁华街道旁边，外表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可是加了许多岗哨，还有全副武装的士兵来回巡逻，禁止所有行人从大楼下的子街走过。大楼对面的子街上也有士兵警戒，不让行人和车辆在这一带停留。匆匆走过的行人，一边走，一边嘀咕：中央银行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呀？一个银行，也不是党、政、军重要机关，怎么连路也不让人走呢？变成衙门了。今天中央银行确实变成了衙门，而且是最大衙门。这个衙门侧面的马路上停了二三十辆高级小汽车，几乎把那条马路都塞满了。

在中央银行三楼的大客厅里，国防最高会议第54次常务会议将要进行。常务委员于右任和居正到得最早，随着他们身后到达的是孔祥熙同何应钦。列席的人也陆陆续续到了。从江汉关那边传来大钟有规律的音乐一般的钟声，一下，两下……打到九下的时候，那悠扬的钟声在早晨的空气中飘浮开去，渐渐渗入到烦嚣的市声里消逝了。

江汉关的大钟敲过九下以后，汪精卫穿着一身藏青色夹着暗红色条纹的法国高级料子西装走进来了。他胸前打着一一条紫红的领带，那张四方型的面孔被衬得更加雪白细嫩，显得比他实际年龄年轻得多。他斯斯文文地缓缓走到一位穿着布衣、身躯魁梧、长髯在胸前飘拂的老人面前说：

“于右老，你们到得早呀！”

于右任曾经是靖国军总司令。以后五原誓师，重振国民军，击溃过奉军刘镇华部。他文采绚烂，书法造诣精妙，还是一位著名文

人。他微微向汪精卫点点头。

汪精卫同居正、孔祥熙与何应钦握了手，对那些列席的却只是伸出手去向他们招了招，微笑着打了招呼。长方形的会议桌子上铺着雪白的台布，常务委员坐在上面两侧，列席人员坐在下面两侧，椅子上都坐了人，只有上面主席和副主席的位子还空着。蒋介石是主席，他没有到武汉，副主席汪精卫行使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的职权。

秘书长张群坐在居正下面，他扫了会场一眼，暗暗检查了一下应到的人数，便对汪精卫说：

“出席和列席的人都到了，王宠惠常务委员因感冒请假，他要徐谟次长代表他出席。因为徐次长昨天偕德大使由南京回来，亦须列席报告。”

徐谟在蒋介石见了陶德曼大使以后，没有在南京多停留，又陪陶德曼坐轮船回到汉口。汪精卫和孔祥熙一道听了徐谟南京之行的报告。汪精卫心里十分高兴，觉得结束这个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有了眉目，蒋介石表了态，其他的人大概没有多少问题了。他要争取更多的人同情与支持，因而决定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在会上，他首先要徐谟报告了这次蒋介石在南京和高级将领讨论的情形以及会见陶德曼大使的经过。徐谟站起来报告，最后说：

“看起来，这次德国出面居中调停，和中日双方接触，希特勒元首还准备提出中日双方先行停战，结束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

何应钦怀着一肚子怨气担任参谋总长的工作，总提不起兴致来。他以为中国无论如何不能和日本开战，战必败。现在他的意见在一步步变成现实，华北沦陷了，上海失守了，南京危急了，怎么收拾这个残局？幸亏有希特勒和陶德曼出面调停，正像古人所说的，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事实证明他的意见正确，再也不能丢失这千载一时的良机了。他生怕国民党元老们不了解中日双方的军事实力悬殊，提出不同的意见，不禁嚅动着嘴，准备

发言,但考虑到自己的地位,不便抢先,只好听听别人的意见再说。他喝了绿茶,润润嗓子,做好发言的准备。

汪精卫等徐谟报告完了,望了大家一眼:

“各位有什么意见吗?”

坐在上面的四位常务委员互相望了望。居正学的是政法,一九三一年就任司法院副院长,第二年升任院长。想起日本提的七条,内蒙要自治,华北与上海不驻兵区域要扩大,禁止排日,共同防共等等,国家的领土与主权受到日本宰割,中国还算什么独立的国家呢?他这位司法院长还能司什么法呢?国际法不必谈了,中国法律也谈不上了,只有日本政府和法西斯军阀说的话,将变成法律条文。这七条怎么接受?可是蒋介石与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都同意了,他有什么办法呢?于右任反对日方条件,认为那是亡国条件,或者说是慢性亡国条件,从东北到华北到上海,这样发展下去,不断出现名为“自治”实则日本控制的政府,而且不驻兵区域会扩大再扩大,直到全国不驻中国兵,而驻日本兵,中国不是名存实亡了吗?这样国家大事,一时竟然没人发言,令他寒心。他这位监察院长不能沉默,但也不必带头打冲锋,他要看看别人的态度。他浓眉下那双发光的眼睛扫了会场一眼:何应钦蠕动着嘴,仿佛要说话,又不想说。孔祥熙胖乎乎的脸上,没有惊异的表情,也没有反对的神情。蒋介石不在,从他的话里可以看到一些征候。他对孔祥熙说:

“是否请孔副院长先谈谈?孔副院长上月二十八号曾见陶德曼大使,知道情况较多,业已考虑数日,可以权衡利弊,提出看法。”

孔祥熙肥胖的手指挟着一根吕宋雪茄,送到嘴边深深吸了一口,旋即吐出乳白色的烟圈,袅袅地飘散开去,烟圈越来越大,变成椭圆形,终于消逝在上空。他的眼光注视着烟圈。他在盘算日本的条款对中国的利害关系,认为最后两个问题提得含糊,要仔细推敲:关税如何改善?外人在中国之权利中国政府怎样尊重?所谓外人,是指日人,还是包括英美和所有外人在内?这一点必须明

确。如果包括英美在内,特别是美国,那么,华北不驻兵区域和上海停战区域须扩大,必然和英美利益发生矛盾,这可怎么办?这不仅丧失中国的主权,而且损害英美在华利益,国际上,特别是英美会不会反对?蒋介石已经同意了,他不好反对,不如暂不表态,先听听大家的。但于右任请他先谈,也不好置之不理,断然拒绝,他又抽了一口雪茄,才慢条斯理地说:

“事关停战,应从军事观点考虑,是否请敬之兄先谈?”

“也好。”于右任点点头。

何应钦希望尽早发泄压抑在胸中已久的怨气,既然有人邀请,正中下怀,迫不及待地应声道:

“早在庐山座谈的时候,我就中日双方陆海空军实力比较,指出敌强我弱,不能抗战,但共产党和那些左派别有用心,一味言战,现在打了整整五个月,结果怎么样?华北几乎完全沦陷,上海早已失守,现在敌军在叩首都的大门了。昨天夜里的战况是:敌军进占句容,分兵两支:一支绕汤山镇北九华山之背,取小道,攻麒麟门,麒麟门位于南京正东,为中山门外之屏障;一支敌人主力自天王寺沿石子路,攻淳化镇,淳化镇当句容入京之要冲。右翼之西路,是攻广德之敌,为避免我军主力,折北取道京建路,占领郎溪、东坝等要点。敌军由此分二路,一路西攻宣城,袭我湾沚车站;一路北攻水阳镇,绕丹阳湖攻我当涂;又一路由溧水北攻秣陵关。秣陵关位于章山东北,方山西南,形势至为重要。简而言之,南京岌岌可危,已陷入敌人大军包围之中……”

“真的吗?”司法院长居正平时只从报纸上看看战争消息,没想到南京已陷入重围,形势十分危险了。他忍不住打断何应钦的话。

“实际的情况可能比这还严重,今天早上敌人也许又攻占了什么要点,要等前方的电报来才知道……”

“这些消息报纸上为什么没有登?”又是居正的声音。

“有的属于军事秘密,有的一般要晚两天才登。”何应钦从来不看报纸上的军事消息,他只看各个战区司令长官部发来的战报,有

的战区的战报也不可靠，只报胜利不报失败。但这一点他没有在会上提出来。

“南京能否守住？”居正惊慌的眼光望着何应钦。他想蒋介石留在南京，大概总有办法的。

“从军事上看，南京的地形是守不住的，敌人只要占领紫金山和雨花台，南京便成釜底游鱼了。”

“不是唐生智守卫南京吗？”居正大惑不解地说，“听说他要与南京共存亡，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要问委员长，他在南京坐镇哩。”何应钦不好当众讲蒋介石和唐生智的事。

“对，介公在南京。”居正仿佛得到某些安慰，其实心中并不了然。

“敌人一面包围南京，一面让德大使出面调停。”于右任用右手抚摩了一下他的黑乌乌的胡须，思索地说：“是否迫使我国签订城下之盟？庸之兄，尊意以为如何？”

孔祥熙听到于右任的话，他仍然不想开口，指着坐在居正下面的张群说：

“岳军兄，你当过外交部长，对日本素有研究，你看这回日本政府用意何在？”

张群是王宠惠的前任外交部长，现在是国防最高会议的秘书长，同何应钦是一个鼻孔出气的。张群以为蒋介石在南京对停战和谈表了态，在武汉由徐谟传达一下南京谈判情况便完事，没料到元老们刨根问底。他是主张和的，却不明说，只讲：

“我赞成敬之兄的意见，中日力量对比悬殊，战争打到这步田地，不如早日达成和议为好。委员长高瞻远瞩，早看到这一层，所以明确对陶德曼大使表示，这几条可以做为谈判之基础。至于我个人，并无主见。”

汪精卫知道何应钦、张群这些人一向主和，蒋介石说了话，他们更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于右任和居正元老们，估计也不难说

服,但是还有列席人员陈果夫、陈布雷、徐堪、翁文灏、邵力子、陈立夫和董显光没有说话,利用何应钦和张群他们的意见,可以消除任何人的疑虑。他问:

“各位有无不同的意见?列席会议的也可以发言,各抒己见,贡献给常务委员,以便讨论。”

居正这位老同盟会员,曾在日本法政大学读书,对日本也有了解,他想来想去搞不通,没等列席的发言,又皱着眉头问开了:

“中日力量悬殊,敌强我弱,非自今日始,当时何以主战,如今何以主和?”

汪精卫暗暗瞪了居正一眼,认为居正的话狗屁不通,这人真是“循常道而行之”,不愧叫做“居正”。他知道元老的意见很有影响,别人不会批驳,需要他自己出来说话:

“国家之目的,在于生存独立,和战不过是达此目的之手段。不得不战时,则战;应和时,则和。诸位大概还记得岳军兄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时的四句名言:和必乱,战必败,败而后和,和而后安。蒋先生当时把这四句话定为国策。卢沟桥事变,敌人欺人太甚,我们不能不战;现在兵败如山倒,大好河山沦陷近半,首都危急到了不能不和之时。可以说现在到了败而后和的时机了。和的目的在于生存独立。”

居正想起蒋介石确实将这四句定为国策,但现在真的到了败而后和的时候了吗?大片国土沦陷敌手,怎么能够生存独立?按照敌人的条件办,不过是偏安一隅。但他不好批驳蒋介石,又说不过汪精卫,默默地想了想这四句话的危害性。他提出疑问:

“根据日本七条谈判,恐怕谈不上什么生存独立了。”

于右任不赞成这个国策,他以为和必乱,战未必败。一时胜败乃兵家常事,现在断定谁胜谁负,为时尚早。抗战中途妥协,当然失败。如能坚持到底,方有胜利希望。败而后和,是屈辱投降;和而后安,是苟且偷安。既然要中途妥协,当初何必抗战?他想起故乡的黄帝陵,忍不住暗中唏嘘:我堂堂炎黄子孙将要成为异国奴

隶，中华民国名存实亡，如何向子孙后代交代？他期期以为不可，一面抚摩大胡须的下半部分，一面微微摇首。他深知孔祥熙、何应钦和张群是一丘之貉，彼此意见一致，不过说法不同。居正对情况不甚了然，虽表示不同的意见，大家表面上对他十分尊敬，但对其意见，并不重视。列席今日会议者，尚未发言，未卜有无一二闯将，敢于披肝沥胆，以效其忠。他微微抬起头来，向下面列席的座位上一一看了过去。他看到邵力子坐在翁文灏与陈立夫之间，真是一个奇妙的安排，也许是巧合：翁文灏是学者，富有书生迂腐之气；陈立夫是党棍，一心要消灭共党，杀气腾腾；邵力子居中，态度尚算温和，办事相当稳健。于右任便问邵力子有何意见。

邵力子在庐山谈话会期间，做为国民党代表之一，曾参与和周恩来、林伯渠、秦邦宪进行国共两党合作谈判。他担心把陶德曼的条件接受下来，委曲求全地和谈，恐怕要遭中共方面反对，于大局不利。他试探地说：

“国共分裂十年，内战十年，生灵涂炭。现在国共合作，形成抗战统一局面，一旦言和，共产党定然反对，团结统一的局面，会不会又归于分裂？”

汪精卫知道邵力子不仅是国民党和谈代表，而且和中共早就往来。共产党的意见不能不考虑，又不必多考虑。他坚决反共，并不赞成什么国共合作。蒋介石因为在临潼被张学良与杨虎城抓住了，逼得不得不走上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道路。联共抗日同议和是不相容的。因为议和而同共产党分裂，是一箭双雕求之不得的好事，不必担心。但他嘴上却隐晦地说：

“从古到今，对国家负责任的人，只应该为攘外而安内，决不应该为安内而攘外。对外战争，是何等大事？如何可以为对内统一之手段？我刚才说过，中国是为求国家之生存独立而抗战，不是为求对内统一而抗战。何况今日之事，主和不会妨害统一，而不主和也不会不分裂！”

汪精卫一番话堵住了邵力子的嘴。翁文灏忍不住开口了：

“如果主和，共产党不同意，他们会不会捣乱？”

“共产党么，主战也捣乱，主和也捣乱。如果主和时共产党捣乱表面化，让天下人知道，我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反正共产党总要捣乱的，”陈立夫一提起共产党就气呼呼的，恨不得把天下的罪名都加在共产党身上，不把他们消灭干净，他死不瞑目。十年内战，几乎要把共产党和红军斩尽杀绝，突然发生了西安事变，逼得蒋介石答应抗战，他们才绝处逢生。现在红军改编，开到抗日前线，一天天扩大势力，使他日夜不安。他特别赞赏日方提出七条当中的第五条：防共问题，日方希望对此问题有相当办法。这样一来，实在太好了。中央百万大军没有消灭了红军，现在有日军共同努力，不难将共产党与红军完全消灭，国民党一统的天下就太平了。他咬牙切齿地说下去，“共产党捣乱也没有什么可怕，日方提出第五条中就有共同反共防共的意思。中日两国合作，共同反共防共，不怕共产党有三头六臂，中日两国军事力量是够对付八路军而有余的。只要军事上取得胜利，党务方面，我和果夫负责，可以保证彻底消灭中共地下党。他们不叛变投降，就枪毙示众。遵照中央过去指示，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放过一个！现在正是时候，再不下决心，八路军和共产党发展大了，就难办了。”

陈立夫说得白沫四溅，几乎溅到邵力和翁文灏的脸上。邵力子掏出雪白的细纱手绢拭了拭脸，暗示他讲话要注意，别老是口喷白沫，溅到别人脸上。翁文灏比较文雅，也有耐性，他侧过身子，离陈立夫稍为远一点，防备他的口沫再次袭击。陈立夫讲得兴奋，忘乎所以，发觉最后两句有点长共产党的志气，灭国民党的威风，他又加了两句：

“当然，不怕八路军和共产党借抗日的机会发展壮大，我们有蒋委员长，有强大的中央军，就是不同日本政府合作，我们单独也可以反共防共，以至于灭共。”

陈布雷坐在陈果夫的下面，他为今天的会议担心。今天的会议，像上海人说的那样，如同开无轨电车，提出这么多的意见，怎么

收拾？如何统一认识？他从侧面提醒汪精卫，说：

“委员长已经接受德大使转达日方提出的七条，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大局已定，下面的文章是如何谈判了。当然，国防最高会议，主席不在，由汪副主席主其事，诸公可以提出同意或不同意见，以供委员长裁夺。”

陈布雷的一席话发生了两个相反的作用，对一些人如同一阵刺骨的寒风，立时冻结了这些人眼中的语言，没人准备再发表什么不同的意见了。对另一些人却是一阵温煦的春风，吹暖了这些人的心扉，坚定了这些人的决心，委员长已经接受七条做为谈判的基础，不管什么人反对也起不了丝毫的作用，拥护蒋介石的人便占优势了。

国防最高会议秘书主任曾仲鸣认为现在是他发言的最好时机，他说：

“我完全拥护蒋主席和汪副主席的决策，和则存，战则亡。正如蒋主席所说：‘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我们何乐而不为？”

“这样丧权辱国的条件，还不是亡国条件，”于右任质问，“那么，什么才算是亡国的条件？”

“东北亡了，华北亡了，现在南京也岌岌可危，这七条一实行，国家的领土、主权和独立，所余无几了。”居正鼓起勇气说。

“恐怕不能这么说吧？”张群不以为然。他没有说出什么道理，只是用蒋介石来压大家，“委员长已经同意了，一定有他的道理。”

汪精卫见时机成熟，掌握火候，来了一个反表决：

“有没有人反对和谈的？”

全场鸦雀无声，只是窗外楼下来传来了公共汽车的喇叭声，电车叮叮当当的铃声，还有那听不清楚内容的嘈杂的人声。一阵市声过去，稍微清静一点，接着又传来烦器的声音。于右任见没有一个敢提出不同的意见，他来了一个表面上有条件的赞成，实际上是不赞成：

“只要是对国家民族有利的事，大概没人反对的。必须真正保

持领土和主权独立。”

大家都点点头。汪精卫乘势说道：

“诸位都赞成？”

“我同意委员长的意见。”孔祥熙抽了一口吕宋雪茄，了却一桩心事，轻轻地把雪茄放到面前宜兴制的紫红色陶瓷烟灰碟子里，徐徐地吁了一口气。

于右任紧闭着嘴。居正说：

“和谈条件要仔细研究，不能丧权辱国。”

陈果夫举起手来表示同意，旋即想起自己不是常务委员，不过列席会议，没有表决权，举手有些失态，暗暗把手放下。陈立夫比他聪敏，没有举手，却说：

“我们没有意见。”

他这句话讲得十分巧妙，你怎么解释都对。他这个“我们”，可以说指他们陈氏兄弟二人，也可以说包括大家，全都赞同；同时，还有一层意思：我们不是出席的常务委员，而是列席，当然没有意见；也可以解释是赞成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意见。

汪精卫脸上露出了微微的笑意：

“我很高兴大家都赞成停战谈和。”

何应钦急于和谈成功，他问徐谟：

“委员长见过陶德曼大使，你和陶德曼一同乘船回来，他谈了什么没有？”

“陶德曼大使表示，日方条件并非哀的美敦书，委员长接受七条做谈判基础，可以说委员长这次谈话很有希望，南京之行是富有成果的。”

“什么时候继续谈判呢？”张群念念不忘他的“败而后和”。在他看来，“战必败”这个论断，也可以说是预言，已经实现了，现在到了“败而后和”的时机了。他暗自欣赏他的四句话做为国策在一步步实现了。

“德国人办事迅速、准确，讲究效率。大使在轮船上就发电报

给柏林和德国驻东京大使狄克逊，现在还没有答复。只要德国方面一答复，就可以继续谈判了。”

“那太好了。”张群高兴得笑了起来，他对汪精卫说：“我们现在就要做好准备，不然，一旦和谈成功，我们会感到措手不及的，汪副主席。”

“是的，谈判方面请王部长具体负责，他今天感冒请假，由徐次长转告他；至于军事方面，可能复杂一些，由敬之兄负责，问题也不大……”

于右任心里想：看上去，日本政府真的要迫使中国政府签订城下之盟了。这么一来，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前途就危险了。邵力子也担忧前途危机，但他不是常委，说话不起作用。他听汪精卫说下去：

“请大家安心等候陶德曼大使的答复吧。”

二

曾仲鸣一口气把国防最高会议的主要内容扼要地谈完了。他端起沙发前面浓香扑鼻的咖啡接连喝了两口，深深地吸了两口气，讲得有点干渴的嗓子稍微舒适一点。

“国防最高会议开完以后，汪主席又同孔祥熙、张群、王宠惠秘密商议，打电报告诉委员长同意接受日本政府关于和谈的基本条件。现在委员长和汪主席意见一致，可谓不谋而合，今后事情好办了。”褚民谊听得眉飞色舞，认为天下大事已定，和谈成功在望。

“委员长对外公开宣传抗战，对内私下盼望和平；嘴上大唱抗战高调，心里吟哦和平低调；一边对日本进攻，节节抵抗，一边同日本言和，步步退让。”周佛海不愧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宣传部长，对蒋介石一言一行无不洞悉。

“请委员长参加我们低调俱乐部，好不好？”褚民谊打诨。

“那怎么可以？人家是委员长，行政院长，又是国防最高会议的主席，要唱的是高调，怎么能和我们一起呢？”曾仲鸣不以为然。

“你是国防最高会议的秘书主任，不也是我们低调俱乐部的成员吗？”

“我怎么能和委员长这样的大人物比呢？人家一身系天下安危，我这区区小主任，何足挂齿？”

“委员长现在也赞成和平，接受日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不是比我们低调还要低吗？”

周佛海见褚民谊坚持他的论调，怕妨碍今天要商谈的大事，他说：

“委员长会见陶德曼大使和国防最高会议消息，是绝密，除了当事人谁也不知道，传出去，万一被共产党知道，一定会遭到强烈的反对和猛烈的攻击。委员长对外只能唱高调，坚持抗战，怎么能够参加我们的低调俱乐部呢？这个玩笑可开不得。”

“我不过这么说说，不会真的邀请最高统帅参加低调俱乐部。那不是要貽笑天下吗？我是说，许多人不对抗战现实，大唱高调，实际上内心和我们想的是一样的，委员长就是头号代表人物。”

“委员长唱抗战高调有他不得已的苦衷，是给共产党、张学良和杨虎城他们逼出来的。没有西安事变，我敢打赌，中国现在也不会抗战。大家都知道委员长的国策：先安内而后攘外，他准备消灭了共产党再抗战。”周佛海自以为对国民党和共产党了解深切，侃侃而谈。

“现在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又是一种局势了。”陈公博担心地说，“这次和谈，可能阻力也不小。”

“共产党一定首先反对。”周佛海说，“我知道毛泽东提出的口号是抗战到底，这个底就是鸭绿江边，恢复‘九一八事变’以前的领土。委员长只提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东北三省根本不提。

日本政府一直提日满华三国携手合作，把东北三省成立的伪满洲国和中华民国相提并论，共产党能不反对吗？能不从中捣乱吗？”

“中国没有理由过问东北三省，东北根本不是中国的地方，更谈不到‘失地’，怎么要收复呢？”陈璧君大发奇谈怪论，她说，“中国以前何曾有东北三省？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收回呢？”

“你这么说，共产党一定要捣乱，攻击你！”曾仲鸣胆怯地说。

“攻击我，我不怕。汪主席常常说，抗战，共产党会捣乱；和谈，共产党也捣乱。让他们在天下人面前捣乱好了。只要能和，事情就好办了。”

“汪夫人要是能出面讲话，言人所不敢言，敢作敢为，我们跟着夫人走，办事就方便了。”褚民谊直率地提出他的意见。

陈璧君有气无力地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说，“我这个人十年来一天只睡两个钟头，好不容易才支持到现在。我不能做什么工作，讲话没有气力，何况我的地位低，人微言轻，没有什么用处。”

“战争这样拖下去，怎么了局？”曾仲鸣叹了一口气。

“如果战争这样拖下去，不等战争结束，我早就倒下去了。”陈璧君用万金油涂了一下太阳穴，想减轻点头痛。

“什么抗战到底，只要和平，什么事情都好办了。一谈和平，不只共产党有意见，国民党内部也有反对的意见，事情就不大好办。”陈公博不相信事情像刚才曾仲鸣谈的那么简单容易。“邵力子不是在会上谈了这一点吗？”

“邵力子的顾虑是多余的，汪主席在会上已经批驳了他。只要委员长决定了，国民党内部好办，大家即使有意见，也只好放在肚子里。”曾仲鸣显出有信心有把握的神情。

“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都是中国人，有什么意见好商量，就怕日本政府说话不算数。”褚民谊说。

“日本政府我了解。日本人讲话办事特别注意效力、迅速、准确、信用，这次又是通过德国驻华大使亲自提出，希特勒元首还准

备出面调停,建议双方先行停战,看来,日本政府不会丧失国际信誉,被天下耻笑。”周佛海曾在京都帝大经济系学习,交了很多日本朋友,特别是河上肇教授给他的印象最深,自命最了解日本。

“既然要和谈,日本军队为什么还一个劲对南京进攻呢?”褚民谊大惑不解,他对周佛海说。

周佛海微微笑了一笑,那笑意仿佛说褚民谊太不了解国际的斗争了,但他讲的时候,语气还算缓和:

“这是一种手段,以战逼和。委员长和汪主席都认为这是敌人策略,迫使中国签订城下之盟……”

“你的意见是说:敌人围而不攻?”

“大概是这个意思。”

“敌人为什么进攻雨花台和紫金山那么激烈呢?”

“敌人占领雨花台和紫金山以后,可以停下来,迫使中国政府在和平条约上签字。”曾仲鸣代周佛海回答褚民谊。

“你不是说和平谈判还要等柏林和东京答复吗?不答复,怎么好继续谈判呢?”褚民谊困惑不解。

“柏林和东京一答复,谈判立刻可以进行,委员长已经同意那七条作为谈判基础,可说原则上已经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柏林和东京迟迟不答复,我怕夜长梦多。”褚民谊说,“徐次长和陶德曼大使已经回来好几天了,为什么还不答复?”

“日本政府一定会答复的,委员长已经接受日本所提七条作为谈判基础,可以说完全满足日方要求,他没有理由不答复。也许有了原则,还要考虑具体条款内容,这就需要时间了。”

“要不要催问陶德曼大使一下?”褚民谊还是有点不放心。

“这些事外交部会考虑的,王外长是老外交家。”周佛海以为这回和谈希望很大。

“他不是感冒了吗?”褚民谊问曾仲鸣。

“他感冒好了,已经到外交部上班了……”

曾仲鸣的话还没有说完,客厅外边忽然有敲门的声音,曾仲鸣

应了一声：

“进来。”

进来的是穿着制服的侍者，他向屋子扫了一眼，走到周佛海面前，低声下气地说：

“周部长，外边有人要求见你。”

周佛海看了一下手表，正好是晚上十点，他说：

“请他进来。”

侍者转过身子迅速退出去了。曾仲鸣问是什么人，他怕刚才谈的这些国家机密泄露出去不好。周佛海对大家说：

“是高司长，我约他来的。”

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从南京撤退到武汉的时候，正好和周佛海同一条轮船。他们两人先在甲板上遇到，谈谈长江两岸城市和沿途风光。经过芜湖的时候，周佛海叹了一口气，说轮船过了芜湖比较安全了，已经跳出日军对南京大的包围圈，可是南京的命运就很难说了。他们当时还不知道陶德曼大使出面调解的具体情况，也不知道日本政府准备提出七条作为谈判的基础。周佛海试探地讨论战与和问题，说他个人的见解是：战必败，而且是大败；和不一定乱，只有和才能安。高宗武也认为中国不是日本的手，不论军事、经济、政治和外交，都比日本差的远。周佛海看过高宗武过去写的对日外交方策的论文，立即吹捧了几句，把高宗武吹得浑身暖洋洋的。第二天上午周佛海特地到高宗武房舱里去拜访一趟，高宗武受宠若惊，两个人在房舱里促膝长谈，相见恨晚。周佛海问高宗武听说过低调俱乐部这个小团体没有，高宗武回答听到外边有人议论低调俱乐部的事，他不甚了解。周佛海给他谈了低调俱乐部并不是什么严密的组织，只是个松散的小小团体，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聚聚聊聊，可以坦率地谈点心里话，不讲官样文章，互相也无约束。如果他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坐坐，交几个朋友，谈谈心，对自己对民族对国家不无帮助。高宗武因为写了几篇论文，被上峰赏识，一跃被提拔为外交部代理亚洲司司长，接着又做

了司长，荣升得很快。可是抗日战争时期，他这个亚洲司司长也不好当。分明知道中国不是日本的手，可是要抗战，不得不和政府唱一个高调。他以为这高调是唱不久的，他这个亚洲司司长也是当不久的。首都如果失守，国都迁渝，国民政府能维持多久，只有天知道了。所以他对荣升，又高兴又苦闷。听到周佛海那一番恐日病的言论，正投合他的心意。他认为自己也是唱低调的，对低调俱乐部很有兴趣。到了武汉，他们两人又接触了两次，周佛海引为知己，认为是可靠的朋友，便约他今天来了。为了慎重起见，没让他听曾仲鸣介绍国防最高会议的情况，估计谈到十点就差不多了，周佛海就约他晚上十点钟来，表面的理由是那时马路行人稀少，避免引起别人的注意。

周佛海在门口欢迎，高宗武跟着走进来，和大家一一握手，一边笑嘻嘻地说道：

“诸位早到了。”

“我们刚到不一会儿，正在等你哩。”周佛海一句话圆了场，然后对高宗武说，“在座各位你都认识，不用我一一介绍了。”

“久仰，久仰。”高宗武对在座的人拱拱手，表示他的敬意。

“高先生宏文巨著，敝人早已拜读，十分敬佩，真不愧是日本通，是我们外交方面难得的人才。”

高宗武见曾仲鸣这么赏识他，心中非常高兴，连忙弯腰曲背向曾仲鸣点头致谢：

“曾主任学识渊博，古今中外，无所不知，道德文章，令人景仰，今天有缘识荆，感到非常荣幸。敝人虽在九州帝大学习过，但对日本其实并不甚了解，不过是略知皮毛罢了。要说日本通的话，周部长才是真正的日本通，他在京都帝大学习，是著名教授河上肇的高足。”

周佛海脱离共产党以后，叛变了原来的共产主义信仰，投奔国民党，混上了宣传部长的要职，最怕人提起他是河上肇的学生。高宗武无意刺了他的痛处，他语意双关地说：